

叙述模塑

保罗·科布利

符号，以及构成符号的元素，构成了库尔（2001a, 2001b）所说的环境域（Umwelt）（这不是后经典叙述使用的术语，尽管赫托 2011 年差点儿使用这个概念，而该概念在赫尔曼最近的研究中很重要 2011b, 2012b）。环境域理论假定所有物种生活在一个由他们自己的符号构成的“世界”，后者是他们自己创造符号和接收符号能力的结果。（例如，苍蝇与人类相比有非常不同的创造和接收符号的感觉器官）。在那些符号活动能力之外有一个世界，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那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无法触及。然而，确实在一个物种的环境域内可能存在各种幻觉——由于对符号的误解，对符号的忽略以及符号不能够百分之百完全再现现实——特定环境域中存活的物种证明了环境域是现实较好的指南。符号学是对各种环境域（Cobley 2010）的比较研究，因此必须要涉及动植物交流，同时主要致力于人类环境域，其包含叙述的诸种特征。

人类环境域可以理解为源自先天的“模塑”方式，通过它能够辨别世界。我们能够以各种形式来使用我们的感觉中枢，这远远超越了苍蝇和其他形式的生命，尽管这些生命形式可能有其感官独特的组成元素（例如，能听见高分贝声音的能力）比我们优越。这一物种特有的模塑方式显然 300 万年前的能人（*Homo habilis*）时期就存在于人类，它先于，并且也是构成发展于智人时期（*Homo sapiens*）（约 30 万年前）的文字编码和解码的基础。在之前的几千年，人类之间的交流似乎完全是靠非语言交流来实现；语言交流，讲话和书写是功能变异而非适应（Gould and Vrba 1982—也参照下文）。照此，人类的模塑在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同时具有非语言和语言交流的特征（Sebeok 1988）或者如迪肯（Deacon 1997:5）所说，我们是“猿猴加语言”。

这里要表明的一点是人类符号活动以及其构成的人类环境域不仅是口头性（verbality）或语言（language）或语言交流（linguistic communication）的问题。而且从个体发生学和种系发生学两方面来看，无论是“语言”还是口头叙述都不是顷刻就出现，本身也并不完整。反之，它们与非语言交流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它们本身也是在非语言交流内部产生出来的。西比奥克信奉洛特曼和库尔的理论。对他来说，从个体发生学和种系发生学上来看，人类环境域显示出了三种模塑，它们同时内在于成人身上，但是在相继的阶段出现。它们是：一级（Primary）（来源于先天区别能力的世界）；二级（Secondary）（建构于语言表述中的世界）；三级（Tertiary）（产生于复杂的文化形式的世界，以一级和二级模塑为基础）（Sebeok 1988）。皮尔斯的分类，第一性（Firstness）（不涉及关系的纯粹特性），第二性（Secondness）（纯粹的现实与关系）以及第三性（Thirdness）（规则与投射）大体上映射一级、二级和三级模塑（Sebeok and Danesi 2000）。它们也大体映射唐纳德的人类文化和认知进化领域，它也出现在“三个连续阶段”：模仿阶段（the Mimetic）（大约 300 万年前），神话阶段（the Mythic）（大约 15 万年前），以及理论阶段（the Theoretic）（2000 年前）。早期人类的大脑具有基本的语言能力但是几千年都没有说话，因此他们的文字交流、叙述和其它形式文化的发展在不同阶段的推进是从非文字阶段产生，最初开始于模仿性的符号活动（Donald 2001, 2006）。由于个体发生总是能概括体现

种系发生，毫不惊奇类似的阶段也在人类发展中可以观察到。

特热沃森 (Trevarthen)，德拉菲尔德-巴特 (Delafield-Butt)、格兰蒂尔 (Gratier) 以及其他受符号学影响产生的研究都参考了新生儿时期和产前那段时间中叙述如何发展，以及如何为将来的叙述做好准备。不同于认知方式，包括那些声称大体上识别了艺术的进化“功能”的认知方式，特热沃森等的研究观察到新生儿和成人看护者之间在手势、音乐和语言方面的互动中形成了叙述。斯特恩 (Stern) 在儿童的早期发育中观察到了他所说的“原型叙述信封” (proto-narrative envelopes)，是一种有意图的动机或是一种能力，能够“系统化叙述式的思想模式的原始形式中的互动事件” (1995:93)。从他关于新生儿发育开创性的见解，他总结出文字语言有助于让叙述明显显现但是“某种叙述模式可以先于语言” (2000:xxiv)。对他来说，新生儿交流中的原型叙述就“像一粒沙展现的世界” (2000:xxxvi)。斯特恩 (1998:7) 注意到孩童从一开始就被带入一个叙述世界因为父母倾向于创造有关婴儿个性的故事，例如婴儿的表达 (expressions) 与某位亲属的表达相似，这可能是出于早期与婴儿的互动。更直接地说，马洛赫 (Malloch) 和特热沃森关注到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研究也包含其中)：“一直以来，无论是在苏格兰、尼日利亚、德国、瑞士或是日本，研究者发现母亲用类似的节奏和语调跟婴儿说话，而婴儿的活动则保持一致节奏” (2009:2)。成年人不仅只是一直对新生儿讲话，而且边讲边伴随着一系列手势和“音乐性”，在这里后者不仅是意味着歌唱(尽管歌唱可能存在- Delafield-Butt and Trevarthen 2013)，而且是活动和说话的一种特定节奏(Gratier and Trevarthen 2008; Trevarthen 1999; Malloch 1999)。这种以唱歌式的方法跟婴儿说话，叫做“妈妈语” (motherese) (Delafield-Butt and Trevarthen 2013)，通常都能够观察到，而且好像几乎是自动的，尽管内容对于孩童来说无法理解：如“那么，谁是个乖小孩？”然而除了非语言交流，成人很难理解婴儿所能识别的语调的细微差别，因为成年人依赖有无限潜能的文字交流，常常“忘记”非文字符号有多么重要和能产生共鸣(对于成人，参照，例如 Sebeok and Umiker Sebeok 1980；关于孩童，参照斯特恩的自传性笔记 1998:4)。虽然如此，婴儿会说话之前，关注的音节串在一起所形成的词必然所表达地是当地共通意义的事物。他们被卷入了模仿表达 (mimetic expression) 以及感应行为 (sympathetic action) 的非文字符号活动，这已经是人类独有的特点了”。

正如格兰蒂尔和特热沃森注意到 (124) 口头叙述的叙述者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化，他不仅用言语讲述故事，而且伴随着细微的变化、应用适当的手势表达感情，并与观众建立良好的关系，观众成为故事的共同讲述者 (cf. Peterson and Langellier 2006; Turner 1996:24)。这样，口述文化中的戏剧、表演和仪式叙述则与新生儿与亲密的成人之间的个体叙述相似。在这个阶段，成人不对没有理解力的婴孩讲述事件。那么格兰蒂尔和特热沃森 (128) 则会问情节在哪里，叙述的单元是什么，它们怎样结合到一起，以及谁讲述/倾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们提出叙述

是在有活力的表达规则中发现，这些表达规则控制和指导着建立在母亲与婴儿的节奏性互动基础上的整个生态交往。成人即兴的言语和歌曲的音乐性，包括肢体活动、手势和面部表情驱使婴儿加入了节奏性的活动中，共同的节奏，抓住支配所有动物活动的基本脉搏，从而使未来的行动可预测，这可能是人类交往最基本的分布结构 (Gratier and Trevarthen 2008:131)。

此外，他们提出（133）协同作用将母亲与婴儿导向各种想象的世界。这些世界的建构是通过共同分享的时间，赋予这些世界一个叙述结构，并且也在情节素和常规的历史基础上传达叙述内容。这些情节素和常规一旦建立，就会刺激预期的行为并有助于促成一种主体间的情感经历。与马洛赫（1999）一样，特热沃森、德拉菲尔德-巴特（2012:174）注意到母亲与6周大的婴儿之间音乐性的对话如何通过互动中调整双方声音的音高来表示“引言、发展、高潮和结尾”。这也创造了有关意图的期待。众所周知的韵文，“绕着、绕着花园”（“Round and round the garden”），反复地沿着孩童的臂膀和手表演，结尾是在小孩腋下挠痒，这一表演是合作性的，在有限时间内走向高潮并成为婴儿可预测的一个仪式（Trevarthen and Delafield-Butt 2012:188）。正如格兰蒂尔和特热沃森所注意到（2008:135），“我们不需要‘心智推测’能力来认识到意图，特别是当它们被编织进有目的、嬉戏式的交流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时。这一见解似乎是支持赫托的观点，TOM或FP，如果它确实有发展，是被包含在叙述中，而不是反过来，同时也证明了赫尔曼的见解：符号学结构使交流意图的存在一开始成为可能”（Herman 2008:255）。

然而不仅是在新生儿与成人之间的非语言符号活动方面的发现挑战了叙述的认知方法的某些前提。在研究产前的叙述倾向时，还同时又有别的发现。后者来自“调整我们的身体如何自然活动的先天能力”，它推进了“叙述创造作为一种社会表现形式，展示经验意图在身体中运作过程。（Trevarthen, Delafield-Butt and Schogler 2011:25）。德拉菲尔德-巴特与特热沃森（2013:207）认为“量化运动分析表明，在婴儿三个半月大，敏感触摸引起的手和指头的微小动作会呈现为一种激活状态下，具有调制性的行为序列模式，这给“叙述想象”提供了基础。”。在子宫中，循环的连续活动变得协调一致，“用一种先天的时间感知创造了各种表达内在生命力规则的叙述”（211）。很快在孩子出生并开始与成人互动之后，就出现了自发的指示和用眼睛和手指示的叙述运动。”（211）

所有这一切强烈建议从其起源来看，叙述并不像认知学家所相信的与心理推测能力密切相关。反之，叙述是由大量非文字的符号活动特征构成，它们具有“原型叙述”的特点。这些进入到个体发生后期阶段的“语言”叙述中，由于我们对历史和考古记录的精通也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也进入种系发生的各个阶段（Sebeok and Danesi 2000; Donald 2006）。这也就是说叙述来自人类环境域，独一无二混合了非语言和语言活动。正如本书一直所讨论地，叙述在文字和口头表现中具体化从而有助于社群记忆，而且斯卡莱斯·杉山指明了，叙述毫无疑问也赋予了狩猎采集社会某些优势。（参见前文第一、二章）。正如意识产生于物质，语言产生于模仿，第三性产生于第一性和第二性，以及二级与三级模塑产生于一级模塑，因此我们可以说叙述不是无源之水。很多运用认知科学发现的人都在寻找一种符合最近的叙述发展的模块或成熟的心理学。确实，令人惊奇地是这些评论员中没有人尝试发表一篇可能成为摇钱树的文章，名为《叙述本能》（*The Narrative Instinct*）（尽管戈特沙尔（Gottschall）在2012年已经非常接近了）。然而，寻找这样的事物是徒劳无功的：1982年古尔德（Gould）和韦尔巴（Vrba）就警告绝对不要将“适应”（该些特点是建立在对其现在角色的自然选择的基础上）与现有效用（current utility）（当下提高适应性的特点，无论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混为一谈。生命体中现在提高适应性，但过去不是取决于当下作

用的自然选择而建构的很多特征逐渐在其后代身上增补为有意义的用图。古尔德和韦尔巴把这个过程命名为功能变异(exaptation)。语言交流(二级模塑)是对人类语言能力中的固有特征和提供敏锐区别能力的先天(一级)模塑方法的一个功能变异。叙述同样是构成人类环境域的非语言和语言符号活动相同或相关特征的功能变异,而不是一种“适应”,“模块”或独立的类似的生物实体。

由于专注于适应性,“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似乎被迫完全依据人物行为和心理来看待叙述。当然叙述不仅只关乎此些事物。例如叙述也同样关涉感觉,关涉移情。斯卡莱斯·杉山(Scalise Sugiyama)解释叙述在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 period)可能是什么样时,对信息的强调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它远远没有考虑到叙述符号与人类主体之外的其它符号是交叠在一起的。它没有考虑最广义的可能,包括情感(affect)。她解释了怪物故事如何兴起,认为它是用于警告小孩不要离开社群的营地,尽管在其解释中甚少涉及情感因素(Scalise Sugiyama and Sugiyama 2012)。说叙述仅仅是提供信息,与说叙述能够刺激情感或引起悬疑相比,前者让叙述发挥了较少的功能,而且这样的理论会冒机械论和决定论的风险。

叙述消费者不只是在理性层面或高度的心理发展层面回应具有投射性的逻辑,被皮尔斯称作“第三性”的科学性特点。他们也在“诗性”层面回应感感觉领域。例如,叙述中即使无法驱动扁平人物,使他们能够达到基恩(2006:217)和格里格(1990)认为可能达到的心理真实性或深度,他们也可以获得人们的喜爱。叙述类型,如惊悚故事、恐怖故事和罗曼司呼吁超越人物心理的一致性,而让偏执狂、悬疑、恐惧、魅力、爱等并存于其中。后经典叙述学似乎是已经忽略了“节奏刺激”(rhythmic impulse)(Trvarthen 1999),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在产前阶段很明显,同时它也在婴儿与成人互动的音乐性中得到促进。就模塑来说,这种节奏是一级与非语言性的;在唐纳德看来则是模仿阶段;而皮尔斯则认为是孩童的纯粹品质——第一性,它出现,随着不断重复,进入年表、期待和程序,进入互动中的第二性,随着后来的发展,再进入第三性的投射、前瞻性领域,这是叙述本身所固有的。大部分叙述是用第三性来表达,但是这违背了第三性依靠第一性和第二性的事实(语言交流和非语言符号活动产生感觉)。关于皮尔斯的分类与叙述的关系,其中一位最深刻,但被忽略的评论员,谢里夫(Sheriff)强调“皮尔斯,尽管不是艺术家或艺术批评家,把艺术的意义(significance of art 视为其第一性品质,而不是其第三性的规约。”(1989:86)他补充道:

无法否认我们不能逃离语言,逃离第三性,皮尔斯向我们证明第三性(语言,象征符号)能够象征性地代表第一性。根据他的符号理论,文学艺术是一种语言(述位象征[Rhematic Symbol])用来展示、描绘和象征直接意识的品质,那对于意识来说是永远非直接的)(Sheriff 1989:89)

将叙述植根于节奏、品质、非语言符号活动和一级模塑非常重要,原因有很多。关于什么是叙述和什么不是叙述以及什么是原型叙述给出了更精确的概念。如特热沃森、斯特恩和其他人所证明地,如果我们知道要找什么,那么原型叙述就能找到。第二,它显示了叙述有不同的“成分”,而这些不仅仅是认知心理过程,如心智解读或构想。准确地说,他们是节奏性、情感性和非语言性的。第三,这些原型叙述成分并不是突然出现:它们在叙述中发生了功能变异,但是在生物圈的其它地方具有不一样的存在,因为并不只有人类使用符号,其它生命体也使用。

第四，这一根源让人们叙述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明显地是“文学达尔文主义对待功能的问题非常不细致，认为“艺术”，包括叙述和故事，服务于直接的心理目的或古老的共同目的。本书从开头就一直论证：叙述的过去功能的残留，以及叙述所有存在的问题，如成见和再现，都能够在从荷马到现在的叙述形式的历史中找到。然而，很明显大部分叙述缺乏能够轻易识别的机械功能。西比奥克在1979年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他的文章汇集了关于动物的“艺术”活动的现存知识。在全面考察了大猩猩的“舞蹈”、园丁鸟装饰鸟巢以及其它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总结出“美学行为”对于那些沉溺于其中的人，显然于求生存无益。然而，吊诡地是它的确通过间接方式对生存起到帮助作用，因为它提高了辨别能力。这是模塑世界所要求的，促使动物有能力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理解世界。然而在人类的叙述能力领域，无论我们寻找多少功能，叙述最绝妙地是它经常没有任何直接功能。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像某些哲学家所认为地那样，叙述能让人们成为更好的人。然而它能够帮助更精确地辨别世界，叙述终将会与其它大量的非叙述方式一起，有机会让世界变“美好”。